

的模式，近些年对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学说颇加赞赏，也介绍过西方教育学。陶行知先生和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也已引起注意，开始进行研究。这些年我们教育界同仁在教改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探索，颇有成绩。但是我国解放以来的教育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我想着重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回顾一下历史。

建国以来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条准则是“培养党的驯服工具”，或者是培养“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反正是培养“工具”，而不是培养“头脑”。其结果是在这些年代里，极左路线横行，搞什么工作都是一阵风，什么风一吹，就一边倒。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驯服工具论的教育思想，大概不算过份。极左路线横行无阻，同知识分子的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思想为极左路线的推行提供了客观条件。1957年反右时，因为和基层党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者，为数少吗？共产党宣言，宣告了共产党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既然为真理而斗争，那就要唯真理是从，既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要人们、要知识分子做驯服工具。

受驯服工具论思想的影响，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限制，同世界各国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我是学物理的，50年代半导体科学我们同日本同时起步，而日本现在是科技大国，工业科技强国。我们不是没有进步，也有值得人们颂扬的卓越成就。问题是别人前进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运动学要讲相对运动，站在快者的车上看慢者的车，尽管慢车也在前进，实际上是在后退，相对距离是拉大了。

由于推行作驯服工具的教育，导致了只要共性、扼杀个性的必然后果。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学说中宣告，共产主义要解放人的个性；所以扼杀个性的教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将其归之于封建主义的教育倒比较公道。

大家都认为，多年来的极左路线使教育界成为受害最严重的部门，是重灾区。“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界教育界点的火，闹的也最凶，可是打倒四人帮以来教育界极左的东西清理过吗？没有。是不是有必要冷静的思考一下，反思一下这方面的问題？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些年，在教育改革中大家做了不少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关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的探索就有不少好的经验；注意提高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志趣爱好；培养创造型、开拓型的人才等；在教育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多渠道办学也颇有成效。

但是，敢于创造、开拓、坚持各自的特色、

热衷志趣爱好等等，实际上都是个性的一种反映。然而，至今尚不愿提出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的问题。我认为深化教育改革，就要在教育观念方面有所突破，而发展和培养有个性的人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为个性恢复名誉，个性是一个褒义词，并非贬义词，个性不等于个人主义。当然个性的内涵外延，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去探索，不断地去总结经验教训。

发展学生个性，是不是否定共性？否。当前有些共性的东西不是不要，而是要加强。比如：爱国主义的教育，增加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这些东西是共性的东西，不但要，而且要加强。我认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是个薄弱环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是最糟的事情。1985年10月，我去过日本。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日本青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我国青年不如他们。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我们要强化这方面的教育。集体主义、遵守纪律等，也是共性的东西，也要加强。这些东西不能同个性对立起来。要清除驯服工具论的影响，发展人才个性，教育我们的学生唯真理是从。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青年也都应唯真理是从，而不是唯其他的东西是从。那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有生命力、创造力，才能开拓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成为时代的强者，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教育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教育者是神圣的，我们要肩负振兴民族的重任，为民族的未来负责，哪怕我们只在一个学校里仅仅起到了我们应有的有限作用，也是神圣的。

采取特殊途径，筹集教育经费

MUST TAKE SPECIAL MEASURES TO COLLECT TH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校长 郝守本

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教育形势，有人认为教育存在着“滑坡”的危险；也有人认为教育处在改革中的完善过程。见仁见智自然各有所依。但是由于教育中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不重视，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素质的优化和社会道德水平的

提高。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的道理是众所公认的。

目前即使还不能说教育出现了全面危机，至少也要承认教育已经呈现出某些危机的征兆。这些征兆的突出表现是师资队伍危机，包括：师资队伍水平大幅度下降；师资队伍优秀人才大量外流；师资队伍后继无人。师资队伍危机实质上是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偏低的后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什么作为国家之本的教育却严重短缺经费呢？

“四化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教师”。可曾考虑到教师需要什么？

“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但为什么新闻报道中却缺少“弃商从教”、“弃官从教”的事例？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现实中是否会真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每一位领导者？

上面引用了这四段话又提了四个问题，目的是呼吁全社会和各级领导者在真正作到“重教尊师”上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教育经费的短缺是众所周知的，每年经费增加的指数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教育经费处于明增暗降的困境。

教师待遇偏低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以中小学教师工资为例，大多数教师的日工资抵不上1公斤鸡蛋的价格。由此可见大幅度地增加教育经费和加速改善教师待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有人会说，目前国家没有能力，需等到经济全面好转后才能办。我认为可以采取下列四个途径来筹集资金，增加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师的待遇。

其一：适当裁军，公开宣布把节省下来的军费移作教育经费。古人云：“兵在精而不在多”，教育质量的提高必然会促使兵源素质的提高，从而加强国防力量。

其二：国家给某一个确定的地区极特殊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宣布该地区的全部收入作为全国教育经费的补充。

其三：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鼓励和欢迎外国社会团体和个人来华出资直接办学。

其四：在全国范围内按省(市)、区、县定期发行“教育基金奖券”。

我认为，只有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特区”，给教育以特殊政策，想前人之不敢想，作前人之不敢作的事去筹集教育经费，才能使教育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有应有的地位，起应起的作用。

· 科技动态 ·

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临床教授 陆卫平

心脏移植俗称“换心”，1960年首先在动物上试验成功。1967年南非的伯纳德(Bernard)首次在人体上移植心脏成功后，美、法、英、联邦德国也相继移植成功，现在各国成功移植心脏的总数已超过2 000例，其中以美国为首。手术后的1年存活率达70~85%，5年存活率为50~78%，10年存活率较低，但最长的一例曾活了16年。中国也在1978年由张世泽等首次移植心脏成功，病人曾存活109天。

心脏移植手术复杂，要求条件苛刻。例如，病者的年龄需在50~55岁以下，不能有其他疾患和感染现象，肺血管内的阻力不得超过6个Wood单位。通常只有到心脏病的末期才施行心脏移植手术。供心者的年龄应在40岁以下，且无心脏病和感染。最后还要做两者在组织上的配合和施用具有免疫抑制性药物以减少病人的排斥反应。此外，在手术后还要经常或定期检验病者是否有排斥反应的可能，然后对症治疗。病者应长期坚持少吃脂肪和盐份，常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生存。并发症可早可

晚，如早期的排斥率是25%，晚期的排斥率是15%，早期得感染者为60%，晚期得感染者为45%。初次被排斥而无法根治时，病者可再度换心。

人工心脏可与心脏移植相辅应用。人工心脏的应用有过渡性和永久性两种。美国的库利(Cooley)很早就用人工心脏过渡而等待合适的供心者再作心脏移植。1982年美国的德夫里斯(Devries)首次用人工心脏作永久性植入获得成功，优点是不需等候合适的供心者。迄今世界上已有70例以上的人工心脏病人。美国的病例较多，病者手术后最长活到622天，通用的人工心脏有Jarvik-7型和Jarvik-7-70型，根据不同的辅助机构和病情的不同而施用。人工心脏的其他优点是手术操作较容易，排斥反应减少，但有时会出现出血和中风(血栓)等并发症。病人死亡原因多半是感染、心肌阻塞和多种器官功能衰竭。人工心脏的前途光明，但仍待加强研究和改善。